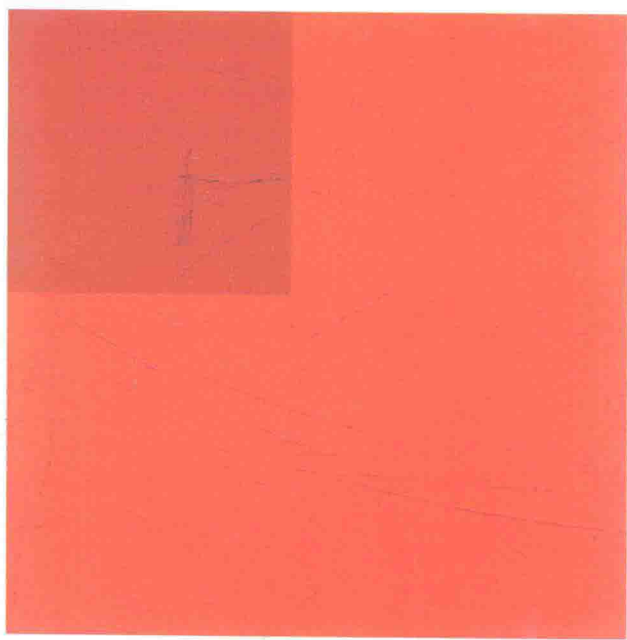


# 友邦还是敌国？

——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

李永晶 著

友邦か敵国か、それとも  
——戦後の中日関係と世界秩序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 友邦还是敌国？

——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

李永晶 著

友邦か敵国か、それとも

——戦後の中日関係と世界秩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友邦还是敌国? ——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

李永晶 著

出品人: 姚映然

策划编辑: 贾忠贤

责任编辑: 章颖莹

营销编辑: 雷静宜

装帧设计: 梁依宁

版式设计: 赵晓韵

出品: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165,000 插页: 2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ISBN: 978-7-208-13762-2/D · 28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友邦还是敌国? : 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 / 李永晶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08-13762-2

I. ①友… II. ①李… III. ①中日关系—研究—现代  
②国际关系—研究—东亚—现代 IV. ①D822.331.3  
②D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7426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本书为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共建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第2期科研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格局转换》研究成果

# 目录

- 自序 如何超越国家间的敌友认识? 1
- | 导论 中日关系与世界认识 6
  - 一、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他者的视角 7
  - 二、东亚民族国家的特质 15
  - 三、认识世界秩序形成的方法 19
- | 第一章 战后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32
  - 一、新视角：非对称性及其历史起源 33
  - 二、非对称性的结构：历史与现实的交错 40
  - 三、世界认识的重建 61
- | 第二章 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自我认同的历史与逻辑 63
  - 一、民族主义视角的交错 64
  - 二、尊王攘夷：天皇制民族主义的起源 73
  - 三、战后天皇制民族主义与历史认识 85
  - 四、天皇制民族主义与“无责任体系” 95
  - 五、民族主义视角的再反思 101

第三章	现代日本的右翼：何谓民族精神？	105
	一、日本右翼与国家的品格	106
	二、新视角：日本的右翼与右翼的日本	111
	三、日本右翼的思想根源：普遍主义的精神结构	123
	四、右翼思想的启示	142
第四章	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谁在决定外交政策？	144
	一、两种“民主主义”的冲突？	145
	二、国民的权力：日本新闻媒体的功罪	148
	三、日本民主政治的结构：政党与政府	156
	四、民主制度与对外政策	166
第五章	现代日本的国民主权：地方自治的视点	169
	一、日本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	170
	二、日本地方政府的定位	171
	三、地方政府的改革理念	176
	四、地方自治的实践：事例分析	181
	五、日本的政府理念与国民主权	188
第六章	现代日本的东亚认识：“东亚共同体”的理念与困境	191
	一、寻找东亚的公共性	192
	二、两种亚洲认识的对立	197
	三、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与中国认识	215
	四、“东亚共同体”与中日关系	231

第七章	东亚世界秩序新论：危机与新生	236
	一、再论中日关系	237
	二、东亚传统世界认识的失范	243
	三、东亚民族国家的困境	249
	四、东亚普遍主义的重建	254
结 语	面向世界：超越“战胜一战败”的思考	260
	一、世界史中的两种“战后”认识	260
	二、“世界国”的自我认识与实现	265
	参考文献	272
后 记	作为个体精神史断章的中日关系论	280

## 自序

### 如何超越国家间的敌友认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12年涉及领土归属的钓鱼岛问题出现危机后，双方的对立逐步升级，许多国际问题的观察家们甚至开始认真讨论两国发生偶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种状况让人感到错愕：双方此前40年间以“友邦”——即“中日（或日中）两国互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为口号的交往，竟然导致了双方互为潜在“敌国”这一暗淡局面的出现。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时刻，这种局面的出现给我们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与任务？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只有再次回到历史进程中重新审视自我，才能将问题的形成机制揭示出来。显然，1945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开始这种反思的一个恰当起点。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建国中，“中华民族”浴血重生，再次成为世界史的主体民族，而世界秩序亦由此幡然一变。今日我们所见之总体性的和平，在其起点处有着中华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



友邦还是敌国？

与曾经获得的荣光——我们曾经是这个世界秩序的缔造者。

然而，在战后直至今日的世界秩序变动的过程中，这个新生的中华民族必然要不断面对全新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的国内战争（1946—1949）与朝鲜战争（1950—1953）的爆发，急剧改变了东亚乃至全球的世界秩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剧变：从缔造者转变为挑战者。近年中日关系所呈现出的困难状况，只有将其置于这种世界秩序的转换与世界史民族的自我证成的过程，才能得到恰切的认识与应对。我们首先要有世界民族的自我意识。

那么，作为具体的现实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日本近年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追问，我们应当怎样面对当下东亚乃至世界自身？如果严肃地审视当下的现实，我们就不难注意到我们的处境具有某种特别之处——成长中的中国一方面正在对世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来自世界的多种压力，这种况境意味着什么？不拘答案如何，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个世界，中华民族作为主体民族才能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并最终参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有鉴于此，在本书中，我们将以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为案例，通过“他者”的眼光，将问题的症候描绘出来。我们将重新审视中国成长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从而再次将抗战建国的世界史意义呈现出来。

关于我们面临的现实状况，兹举一例说明。在今日海内外的新闻媒体中，我们常会看到诸如“中东问题”、“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多种关于“问题”的说法。这一说法本身很少

用于当今世界的大国，因为“问题”本身具有“麻烦”、“有害”，因而“有待解决”等消极含义。然而作为例外，我们常常会在日本的中国论中看到“中国问题”这种表述。在一些当代日本学者和政治家的认识当中，中国的发展（或者说“崛起”）充满了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地区秩序的安定，因此日本的繁荣与和平有赖于“中国问题”的解决。

无须说，这个“中国问题”的说法对我们而言显得有些刺耳。但正因为如此，它激发了我们对自身的发展状况的思考。比如，对于我们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即现代国家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是否形成了清晰的目标认识以及与其相辅相成的目标约束机制？中国将如何顺利融入并建构这个世界的秩序，无论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相互误解？对于这些问题，在本书中我们统称其为“世界认识”的问题。对21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而言，这一问题之重大不言而喻。

因为问题重大，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地加以分析。为此，本书将致力于下述个案问题的具体分析——仿照前面的说法，我们将致力于分析“日本问题”，即对中国的成长与发展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因素的“日本问题”。具体而言，此处的“日本问题”不是指日本自己所设定的诸如“成为正常国家”、“成为政治大国”、“摆脱战后体制”等国家目标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如“修改宪法”、“历史认识”等具体问题，而是意味着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与日本交往的问题。在战后东亚世界秩序的背景下，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方式，也就等同于与世界的交往方式。

友邦还是敌国？

这种主题设定将导致我们在展开论述时要面临特别的困难。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主要的约束性要素——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近代世界体系，必然造成国家间或敌或友的关系。这种国家观念以人类作为生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感为代价，支配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史进程。

从今日世界社会的现状来看，民族主义正在耗尽其历史的正当性，因为它正在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新变化，诸如世界政治秩序的重新组织、自由贸易的迅速展开、国际法的进一步制定与落实、传媒与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等，将人类的普遍联系与共同属性凸显了出来。在国家、人民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全新的性格。显然，这也正是中日关系的世界秩序背景。这种以普遍交流为特征的秩序，正在消解并替代曾经充满国家间对立与敌意的世界秩序。

因此，如何克服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从更大的区域范围乃至世界整体的角度看待安全、和平与繁荣问题，成为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问题，我们只能求助科学的分析，而非情感的好恶。正因如此，本书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相关问题，致力于将“友邦”与“敌国”观念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揭示出来。在政治的层面上，只有继续克服敌友这一陈腐的观念，我们才能主体性地推进世界秩序的转换，世界社会也才能看到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

最后，要再次强调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现代中国如今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正置身于这一大时代的情境当

中。这种具有人类史意义的状况要求我们具有高度的时代自觉与历史使命自觉。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发展的世界史意义，也才能确保我们自己的健康成长。

2015年2月1日

于昆山寓所

## | 导 论 |

# 中日关系与世界认识

众所周知，最近十数年来中日关系呈现出相当紧张的状况；其中，以钓鱼岛为核心的领土与领海争端、以靖国神社为核心的历史认识争论，动辄成为问题的火种。在现代政治环境——诸如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当中，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敏感度一再得到强化，复杂的主权归属与历史认识之争从根本上说是为彼此定位的问题——中日这两个邻国，到底是互为“友邦”还是“敌国”？换个角度说，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1972年双方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

显然，中日两国间的具体问题包含着事实与认识两个层面，就“事实”方面而言，双方动用国家力量的行动——诸如围绕钓鱼岛主权之争的舰船派遣、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外交语言上的较量——诚然容易被视为互为“敌国”的象征；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从“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东亚世界秩序的“事实”来看，绵亘于中日关系之间的这些问题，无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某种延续或曰遗留。“二战”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中国的内战、朝鲜战争、美

苏“冷战”、越南战争、“冷战”结束等这些坚硬的事实,对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只有在世界秩序的形成与变动的视角下,我们才能对中日关系中的各种“事实”形成更为深刻的认知。

同时,中日彼此的认知与定位,构成了“二战”后直至今日东亚世界秩序的构成性因素;这种因素在今日的角色,越发活跃与重要起来。就此而言,中日之间真正重要的问题,毋宁说是如何在世界秩序的生成与变动的过程中,理解自己与他者的行为,从而有意识地达成有益于这个世界自身的目标——以获得承认与理解的方式,实现相互交流与各自的发展。“友邦”或“敌国”并非是有待达成或消解的状态自身。只有这些意味着“关系”与“事实”的状况得到了透彻的认知,人们才能相向而行,建构并落实真正的和平与发展机制。

下面我们将首先阐明,近年中日关系的紧张状况,其发生机制有着上述自我与世界认识层面上的根源。中日两国彼此认知视角的差异,根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一系列格局变动与安排,即战后的世界秩序。由于这种视角的差异反过来强化了战后东亚秩序,其视角本身正在成为我们追求和平与发展这一共有目标的障碍。只有从战后世界秩序生成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更准确而深刻地认识中日关系的性格及其表征。

## 一、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他者的视角

对于现代中国观察家以及研究者而言,“中国社会今后将

友邦还是敌国？

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今已然成为他们必然要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缘由并不复杂：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取得的成就引发了关注自身与关注世界的人们的瞩目，因为至少从经济总量的激增与规模上看，中国正在对世界社会的安定、繁荣与发展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显然，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视角，取决于回答领域的设定。比如说，上面所说的“变化”主要指哪一领域或层面的变化？评价相应变化的标准，来源于中国社会内部，还是源于世界社会？毋庸说，提问以及回答的方式正表明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首先构成了我们自身关心的问题。

上述有关“认识”的复杂表述意味着，迄今为止，我们的自我理解与世界认识仍存在着问题；在新的世界秩序生成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重建这种认识，以达成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有必要从科学的质疑开始，找出并分析误认的生成机制，然后克服这些旧机制、旧观念的束缚，最后借助新知识与新观念，建构新的世界认识。基于此种目的，本书对“日本”这一世界社会中的他者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构成了我们进入问题、解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目的本身。这种讨论，将向我们揭示出重建中国世界认识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达成此目的的方法与手段。

## 1. 现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关于“中国社会今后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问题，作为

讨论素材,首先让我们引用一位日本学者的具体论述:

我认为中国社会将显示出向过去进化的社会主义的特征。这里,“向过去”这一说法具有如下意义。第一,学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了个体的社会地位,这种倾向让人联想起现代中国与通过被称为科举的官僚选拔考试产生精英的传统中国的连续性。第二,以这样选拔出来的精英为中心,政治、经济得到运营,而处于精英核心的国家机关干部可以独占社会资源,这与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他们为成为官员做出了巨大的教育投资,一旦科举考试合格,就会独占权力、财富、威信——角色相似。第三,这样选拔出来的精英并不主张自己所属阶级的利益,而是自始至终在考虑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活动,人民也如此期待精英的所作所为,这与传统中国的统治方式极其相像……其次,“进化”这一表现并不单纯具有“回归”的含义,它还具有现代的要害这一含义。从身份主义到业绩主义的价值观念变化,尤其是新中间阶层所表现出的获取信息能力的向上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参与要求的扩大,今后将获得发展。这就是“进化”所具有的含义。最后,“社会主义”是指,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制定的制度与思想一部分会发生变化,但它们的总体会得到维持。<sup>1</sup>

---

1 園田茂人:《不平等国家 中国:自己否定した社会主義のゆくえ》,中公新書,2008年,第177—178頁。



友邦还是敌国？

这些说法摘引自日本社会学家园田茂人在其《不平等国家：中国》一书中对现代中国变化的讨论。这里略作说明的是，园田这本书属于日本创刊于1962年的“中公新书”系列的一种。在日本，被称为“新书”的作品通常是向大众普及某个专业领域知识的读物，执笔者多是某个领域已取得一定成就的专家。由于既具有专业深度又浅显易懂，“新书”通常具有广泛的读者。可以说，这种“新书”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知识精英与一般市民阶层形成一个“知识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由于其较高的知识性格，能对比较复杂的内外事件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

园田在他的这本“中国论”中，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互交错”的角度出发，依据经验事实分析并讨论了中国的“学历社会”、“农民工阶层”、“女性阶层分化”、“都市中间层”的现状，最终得出了前面引用的结论。由于作者使用了大量统计数据，论述展现出了高度的客观性。

笔者在这里之所以不惜篇幅地加以引用，是因为它能够引发中国读者思考：日本学者的见解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未来变动方向？而与这个问题相比，我们在这里更关心的是：现代日本社会的这种普及性的“中国认识”与我们中国知识界的自我认识具有怎样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中日关系的建构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如果继续追问，上述问题将进一步引发新的问题：中国一般读者层、普通民众所具有的日本认识，与日本社会的自我认识有怎样的异同？

上述追问将我们引向一个真正值得忧虑的问题：与日本的